

鲜卑时代的艺术再现

——评系列长篇小说《鲜卑时代》

刘文斌 哈宝龙(蒙古族)

内容提要:魏晋南北朝又称鲜卑时代,是我国各民族由纷争走向融合的时代,是社会大发展的时代,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但由于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推行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致使这段历史被有意或无意地疏忽和歪曲。内蒙古作家邓九刚、田彬等创作的系列长篇小说《鲜卑时代》,以其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新颖独特的艺术手法,真实而又生动地再现了鲜卑时代北方草原民族的社会状况和自然风貌,不仅显示出中华民族历史的丰富性,也开拓了历史小说的艺术空间。当然,《鲜卑时代》也存在某些败笔。

关键词:鲜卑时代 斛律金 拓跋珪 宇文泰 冯妤

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

系列长篇小说《鲜卑时代》^①包括邓九刚著《敕勒将军斛律金》、田彬、张新绪著《黑獭宇文泰》、海伦纳(蒙古族)著《金雕拓跋珪》、柏青、江涛著《韬晦太后冯妤》、李悦著《千金公主》,这些作品把我们带回到1500年前,即史学家所谓的“鲜卑时代”。那是一个北方游牧民族主宰中国北方半壁江山的时代、一个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相互争斗与融合的时代,也是一个群雄并起的时代。拓跋珪是率领鲜卑统一北方的北魏开国皇帝;宇文泰是继北魏之后建立北周鲜卑王朝的奠基者;冯妤太后是位一度执掌朝政的改革家;千金公主是力图反隋复周的一位传奇式的女子;斛律金是将军,也是一位出色的诗人。这五部小说以鲜明生动的形象,艺术地再现了他们生活和斗争的环境,揭示出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

近年来,受舶来的“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一些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肆意“戏说”历史,

拿历史人物开涮。在某些作者的笔下,关公可以和秦琼开战,杨贵妃竟然与李白醉酒,秦桧成了具有雄才大略的盖世英雄,杨子荣因和土匪头子争风吃醋而丧命……此类作品中,历史人物的功罪是非被混淆,善恶美丑被颠倒,历史规律被践踏。它们在让读者吃惊于作者想象力之异常丰富的同时,不能不令人对其创作动机产生怀疑。与此相反,“鲜卑时代”中的五部小说严格遵循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原则——“大事不虚,小事不拘”。《鲜卑时代》的作者们认真研究史料,力图按照历史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生活,作品中的虚构部分不过是在符合历史真实基础上的合理想象。我们看到,《黑獭宇文泰》在每一章中都将与本章内容有关的史料置于篇首,作为本章内容的提要文字;《敕勒将军斛律金》一书中常引用有关史料作为其所写内容的佐证;《金雕拓跋珪》在每一页的下面对文中涉及到的古代地名、人名等予以注释。五部书中写到的

大的历史事件和主要人物的重要活动,均有据可考。当然,仅凭史料构不成文学作品,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想象和虚构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作者们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其作品中虚构了大量逼真而又生动的细节。诸如,斛律金儿时跟随父亲去洛阳参观正在修建的龙门石窟,斛律平和骠道元观赏阴山岩画、游览赵长城遗址,高欢生命垂危之际听取斛律金用鲜卑语唱《敕勒歌》,等等。这些细节虽然史无明文,但却完全可能发生,符合艺术的真实。《黑獭宇文泰》的作者曾撰文引《木兰辞》中“朝辞爷娘去,暮宿黑山头”,以说明花木兰从军就在武川一带,所以她和宇文泰相互倾慕,符合艺术的真实。从中不难见出作者追求作品真实性的良苦用心。其实,即使没有上面两句诗作为佐证,小说中写宇文泰和花木兰的相互倾慕也并非不可,因为他们俩人堪称人中龙凤,又有着共同的志趣,还都曾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从军作战,相互倾慕乃是情理中的事。这样描写,对塑造这两个人物形象大有裨益。何况《木兰辞》本身就是文学作品而非史料,花木兰是否真有其人,也无从考证。由于正确处理了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关系,因而使得这五部小说既给人以历史感,又生动有趣,引人入胜。

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因受“左”的思想影响,文学创作中往往只写人的阶级性和政治表现,只是在进步与反动、善与恶、美与丑这种两极对立中去刻画人物,使得人物形象简单化、概念化。而上述五部小说则突破了这种单一的传统模式,将人物置于社会的大背景上,从社会的、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角度去审视人物,真实展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千金公主既嫉恶如仇,为报国恨家仇坚忍不拔、忍辱负重,又单纯脆弱,在复仇理想破灭与爱情严重受挫后拔出匕首自

杀。拓跋珪在战场上杀伐决断、夺人性命于意念之间,表现出其志坚如钢的英雄本色,又对贺兰妃爱得如痴如醉,其柔情似水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冯紆为登上太后的宝座韬光养晦、忍辱负重,并巧妙地先后除掉了政敌邢则、习蓉蓉、乙洪等,但在爱情上却大胆开放、敢爱敢恨,先后多次与情人李奕、王睿、李冲幽会,以至于被小皇帝拓跋弘发现而使自己陷于被动。由于这五部小说真实地刻画出人物性格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故而使得他们给读者以栩栩如生、历历在目之感。除了这些主人公之外,五部小说还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诸如美丽贤惠、深明大义贺兰王后,雄才大略、英武智慧的高欢,忠心耿耿、足智多谋的燕凤,为大义慷慨赴死的乙弗氏,替父从军的花木兰,以及骄横跋扈的乙洪、荒淫无度的拓跋浚、认贼作父的贺拔岳、元洪业,等等。作者们将人物置于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在危机四伏的宫廷、白刃相见的战场,在权力与女色的诱惑下写出他们心灵的变化,而且还以人物的心灵为镜,折射与反映外部的大千世界,寻求人物历史活动更深层的原因。这样,就使得作品在塑造人物形象的同时,还再现了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民族的社会状况和自然风貌,为今人认识“鲜卑时代”的历史,提供了形象而生动的教材。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鲜卑时代》的作者们认真探索,大胆创新,使其作品具有丰富的文化与审美内涵。在小说结构的安排上,《黑獭宇文泰》和《金雕拓跋珪》的开头部分,采用放射性结构。前者围绕武川帅府军前紧急会议的热烈争论,陆续穿插交代了这部小说中故事发生的背景、一些主要人物的身世及其相互关系。后者则围绕拓跋珪称王前,贺兰王后走向祭坛的悲壮场面,穿插回溯了此前拓跋珪与其母贺兰王后的艰难曲折的经历等,为故事情节的进一步发展作了铺垫。这种放

射式的结构安排,既使小说一开始就紧紧抓住读者,又有助于对全书中的主要人物做出清晰的交代,还大大节省了篇幅。《敕勒将军斛律金》各章、节的安排,采用了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将故事的各个片断巧妙连缀在一起,自然熨帖,天衣无缝,显示出作者非凡的写作功力。而其余两部小说则根据各自的叙事需要,采用传统方式,按照故事发展的先后顺序安排结构,娓娓道来,步步深入,扣人心弦。在语言运用上,《黑獭宇文泰》从古典诗文中吸取营养,文白交杂,简洁凝练,典雅流畅,使读者仿佛置身于古代社会的语境之中;《金雕拓跋珪》中的语言则多采用北方少数民族的表达方式,大量运用生动贴切的比喻,在使作品诗意化的同时,其民族特色也愈加鲜明。《千金公主》文笔细腻、语言优美,对人物的肖像描写采用工笔画手法,穷形尽相、毫发毕现,在清晰的展现人物相貌、服饰的同时,也显示了人物的出身、教养和性格。《韬晦太后冯妤》的语言平实流畅,故事情节悬念迭出、曲折动人。作者们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探索与创新,大大深化了作品的思想内容。

“鲜卑时代”是我国重要的历史阶段,但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特别是历史上封建统治者推行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的政策,使这段历史被有意或无意地疏忽和歪曲,以至于有历史学家慨叹:“自公元220年后汉覆亡至589年隋朝的统一,其间的300多年是中国历史里失落的三个多世纪。”^②还有人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长期混乱和令人失望的时代,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一段尴尬局面。其实,如前所述,“鲜卑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是各民族由纷争走向融合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大发展的时代。“据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芦荻回忆,1975年6月18日,毛主席在谈到魏晋南北朝时有一段很深刻的话,他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大动乱、大分裂,这不好,但

当时的另一个方面是,南方的广大沃土,全面地得到了开发,生产技术普遍提高了。这是经济上的发展。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后,战乱频仍,南北对峙,这不好,但民族大融合,大家庭在新组合中稳定了,文化也交流了,丰富了。”^③当时的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其中的杰出人物拓跋珪、宇文泰、冯妤等,为推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邓九刚、田彬和活跃在当今内蒙古文坛上的实力派作家海伦纳(蒙古族)、柏青、江涛、李悦等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入发掘本土文化资源,并通过艺术想象补充、完善这段历史链条中断裂和遗失的部分,以文学的形式生动形象地再现“鲜卑时代”的社会风貌及时代精神,其意义不可小觑,它不仅显示出中华民族历史的丰富性,也开拓出历史小说写作的新空间。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作品通过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显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些规律。《千金公主》的主人公不仅有着美艳绝伦的外貌,而且具有超凡脱俗的智慧和坚韧不拔的毅力,然而,她却多少有点类似于《红楼梦》中的贾探春,“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④她所从事的反隋复周活动,虽然其个人动机无可厚非,但从社会历史的视角去看,则不过是试图煽动尚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阶段的北方少数民族,去推翻封建制度已经相当稳固、经济也相对发达的隋朝,这实质上是企图拉历史车轮倒退,所以必然落个悲剧的下场。这正如恩格斯当年批评斐迪南·拉萨尔的历史剧《弗兰茨·封·济金根》时指出的那样,济金根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⑤。小说形象地警示人们:“世界潮流,浩

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此外,这五部小说中那些杰出人物的优秀品质及进步思想,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仍有其积极的启示作用。诸如拓跋珪摒弃狭隘民族主义,虚心采纳燕凤、张袞、许谦等汉族老臣的建议及其为民族大义而不惜委屈自己的高尚品德;冯太后在经济上推行“三长制”,对官吏实行“班禄制”,蔑视封建礼教和鲜卑族陋习,主张男女平等,追求真挚爱情;张袞关于“民心和士气是民族之魂”,以及“血仇,血仇,血流尽了,仇恨的火种又埋下了。前人的鲜血,又哺育着后人复仇的火种”的议论,等等。这些对于我们今天弘扬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从而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疑具有借鉴作用。

金无足赤,系列长篇小说《鲜卑时代》中也存在一些败笔。

其一,在人物刻画和历史事件的反映上存在缺憾。多数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似乎缺乏深刻的理解,运用得不很自觉。其作品基本是在写军事斗争,而对于经济、政治及文化则很少涉及。其实,战争与政治关系密切,“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⑥而决定政治的基础则是经济,正如马克思所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⑦五部小说在写到当时的经济,如农业、畜牧业的状况时,往往一笔带过,对政治也涉及很少,这就显得有些片面了。此处仅以《金雕拓跋珪》为例略作分析。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指出,魏道武帝(即拓跋珪)有战必胜,迅速建立起封建大国,是由下列几个原因造成的:在军事方面,主要是利用“班赐群臣将士各有差”的办法,调动了将士们英勇作战的积极性;在政治制度方面,“依靠汉族士大夫,建立起封建政治制度的统治机构”,稳定了政局;

在经济方面,“拓跋珪即代王位,首先重视农业”,他还“亲耕籍田,为百姓做表率”,为增强国力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⑧由此可见,拓跋珪等之所以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杰出人物,根本原因是其代表了当时的先进生产力,而并非只是或主要是靠其个人的武功、谋略和品德而取胜的。而小说中的描写,则使人觉得这位鲜卑族领袖总是不停地打仗,而其目的又主要是为了抢夺美女,亦即作者所谓“拓跋珪把美丽和战争一同揽到怀里”,“美丽的女人和战争成为一代英雄成长的摇篮”^⑨。此种说法,如作为广告用语,当然不难理解,但若作为科学的判断,则离谱得很。若按照此种观念去描绘历史人物和事件,自然难免失之偏颇了。

其二,作品中的性描写太直太露太滥。作者们似乎习惯于兴致勃勃、不厌其烦、细致入微地描绘人物的性心理、性状态、性体验。须知,“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⑩,这已成为学界的广泛共识。据此,文学作品理应在给人审美享受的同时,还给人以思想启迪,而不能靠感官刺激去取悦审美趣味低下的读者。但不幸的是,近年来文学作品中自然主义的性描写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不能不令人担忧。试想,万一将来的某一天,文学创作真的被人视同于脱衣舞表演,文学作品也被人视同于别的什么不上台面的东西,这岂非文学的莫大悲哀。当然,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不是不可以,但应服从于故事情节发展和人物形象塑造的需要,而且还要适度、含蓄、点到即止。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海明威、曹雪芹、鲁迅等都以其作品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值得认真学习。这五部书中的《金雕拓跋珪》处理得比较好,作品中无论是描写拓跋珪和他喜欢的热情奔放、颇具野性美的奴真王妃热烈做爱,还是描写他耐着性子与他厌

恶的神情冷漠、身体干瘪的慕容王妃勉强做爱,都不仅是故事情节发展所必需的,而且也是为了更好地塑造这位英雄的形象。他为了阻止独孤部的进犯,宁肯将其心爱的奴真王妃献给独孤部首领刘显;而他为了笼络对本国构成严重威胁的后燕国,又勉强地与他并不喜欢的慕容王妃做爱。作品通过这两个细节的描写,进一步显现出拓跋珪为了民族大义而甘愿委屈自己的高尚品德。固然,作家们之所以煞费苦心、浓墨重彩地去写那个虽为延续人类所必需、也能给人以生理快感,但确又有其不雅一面的性,自有其难言的苦衷。作家也是人,他们也有家人,也食人间烟火,又身处商品经济社会,岂能不考虑自己作品的经济效益?但问题在于:倘若创作时一心只想着作品的销量,却很少甚至丝毫不顾及自己作品的社会效益,特别是它可能给青少年的纯洁心灵所造成的污染,这是否有些顾此失彼了呢?是否有负于作家这一“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荣称号呢?

系列长篇小说《鲜卑时代》的成功,为繁荣少数民族地区文学艺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作家,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入发掘本土文化资源,发扬团队

精神,集体攻关,协同作战,才能大有作为。反之,如果脱离本民族、本地区的实际,一味地观风赶潮,追“新”逐“后”,疲于奔命,是不会有太大出息的。

注释:

- ① 《鲜卑时代》,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 ② 转引自李悦《史无前例的文学举措,大气磅礴的草原史诗》,《内蒙古作家》总第 82 期。
- ③ 温家宝:《同文学艺术家谈心》,《中国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 20~21 页,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7 年版。
- ④ 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回。
-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560 页,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 ⑥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164 页,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
-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 32 页,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 ⑧ 《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第 456~458 页,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
- ⑨ 海伦纳:《金雕拓跋珪·卷首语》,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 ⑩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责任编辑:周翔】